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2.016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莫会星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关键词:洪武;明中都;中央集权;淮西勋贵;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2-0106-07

Construction and Abolition of Zhongdu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Hongwu Emperor in Ming Dynasty

MO Huix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Fengyang Zhongdu in Ming Dynasty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apit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capital of the Ming Dynast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selecting the site for promoti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apital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orthodoxy, and striking for horizontal power.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establishment of the capital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rend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Hongwu.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 Yuanzhang and the Huaixi Group, the short life of Zhongdu was determined by Zhu Yuanzhang's subjective changes in the pursuit of the imperial throne, the orthodoxy of the stat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the balance of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determined by Huaixi Group who aimed to nurture geological politics to maintain its interest in the imperial court.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 Yuanzhang and the Huaixi Group create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Keywords:Hongwu Emperor; Ming Zhongdu;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Huai Xi Xun Gui; political ecology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占领元朝集庆路(今南京),欲以其为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基地,并将南京改为应天府,自号吴国公,于1368年正式称帝,改年号洪武,正式开启明朝的统治。朱元璋因把控南京而最终挟定天下,得位后却对南京立都事宜不甚在意,而是“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但见汴梁“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1]1682}。便立即将明都城规建事宜落实到其故乡凤阳。但建中都于凤阳是否合理以及其最终罢建的内在原因仍有待探讨。

诚然,明中都的建立与罢建均非明廷朝臣所能左右,其从选址开始就彰显了洪武帝的意志。关于明初定都,朝臣多提议建于中原之地洛阳,或是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是旧京汴梁,可控漕运,甚至是元大都北平,宫阙完备……但是都被洪武帝一一否决^{[1]381},最后决意在临淮旧城以西建立中都,并以应天为南京,以汴梁为北京。但是从中都的规建规格来看,其最初可能并非为陪都,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国都,若无特殊原因,绝无可能轻易罢建,故中都城从选址规建到罢建均反映出明初洪武帝初定天下时的政治心理与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

收稿日期:2022-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重大项目:清代安徽舆图整理与历史图集编纂(2018VJX024)。

作者简介:莫会星(1996—),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地理。

一、定址以“求升崇”

朱元璋以布衣起事,率军匡定天下。初据滁县,因“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1]17}”,便听取谋士意见,渡江取南京,依靠南京在经济、漕运、军事等层面的优势,迅速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南京水陆兼备,为龙蟠虎踞之地,却没有对洪武帝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在对南京宫室殿宇进行修建时也多从简,虽然有节制民力为由,但事实并非如此。洪武二年(1369)九月,洪武帝下令以临濠(今凤阳)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今南京)之制焉”^{[1]881}。中都工程涉及全国百工技艺九万余人,另有军士、役夫数十万人,甚至掀起了明初“凤阳移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其劳民程度可见一斑,与恐大修南京宫阙而劳民伤财之虑大相径庭。况南京旧为都邑,宫室城池结构基本完备,单从工程量来看,选取南京才是节民的最佳方案。洪武帝重新规建中都,规格犹按京师(即南京)制,如此“舍本逐末”的行为透露着洪武帝在初定天下时急于实现衣锦还乡之愿,以及借中都实现故乡升崇之意。

1367年(吴元年)—1369年(洪武二年)为明中都定址阶段。洪武帝对故土的各项政策以及淮西集团的反馈,无不透露着其试图升崇故里的意愿。吴元年(1367年),待天下局势稍定,洪武帝便改濠州为临濠府,次年下令修整濠州旧城,开六门,作九街二十四坊,这是对凤阳地区的初步升崇。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北伐,夺取元大都,政治形势的改变使洪武帝最初定都开封的计划动摇,朝中议都之事重提,此时正是选址明中都的关键时期。

明中都在今凤阳县,古钟离地,“居皖北之中,峰峦沓峙,崒嶭盘纡,淮水萦回,渊腾环绕,民多至直,俗尚节俭,苍然有朴厚风”^{[2]1}。早年洪武帝在此发迹,一时显于世,“国朝启运,为帝乡兴王之地”^{[3]111},“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4],再次议都时,洪武帝自然希望能将中都落址于凤阳。这虽是洪武帝的主要意愿,但实现了携有从龙之功的淮西集团的诉求。

南京可控江左,亦可制华北,兼具苏州与扬州的水陆优势,是极易据城行军之所^{[5]135-137},若以南京为都,等于把控住了南下北上的要塞,从山川形势的角度看,此地被认为凝聚“帝王之气”,似乎更适宜为都。另洪武帝据有南京后得以削平患难,践天子位,以南京为都则更能够彰显一统天下的威仪。

但从明初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南京似乎很难成为洪武帝定都的首选。

其一,钟离故地(即凤阳)常为州郡,素来民风简朴,且“水旱易于成灾,生产不甚发展”^[6],并非富庶。洪武帝早年凄苦,昔年其母逝,曾得助乡里,后人皇觉寺,方得供养,故而乡土情怀甚重,在立朝后自然希望将故土的地位抬高,经济有所发展。选址凤阳为中都,既可以实现其“衣锦还乡”之愿,又可以使得乡里得沐皇恩,多有惠利。此外,洪武帝是以布衣起势,其淮西集团也是在伐元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原本无地缘势力依靠,如若将明初的政治中心转移至凤阳,更加便于国朝吸收凤阳人才,培养如同隋唐陇西贵族一般属于自己的地缘势力,提升地域优势,使其像国初的淮西集团那般,为自己的帝位营造权势支撑,故而当初刘基言“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7]3780},洪武帝仍执意将中都落址于凤阳。况且,淮西集团最初营利于洪武帝,由于具备相同的地域背景,洪武帝对淮西集团极为重视,该集团是洪武本意在朝中主要培养的势力,扩大该集团的权势支撑也极为必要。另外,洪武帝选址中都更是有意培养新的地缘势力。淮西集团作为洪武帝匡定天下的主要势力,固然强势,但集团内部过分居功,“(李)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按:李善长子)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7]3771}。淮西集团对帝王的敬畏之心已有懈怠。由于国初的淮西集团多是在洪武帝平乱途中逐渐依附形成的,彼时身份悬殊不大,尚无君臣之分,洪武帝素表亲厚,集团内部对洪武帝敬重稍减,而自恃较多。洪武帝需要重新构建新的地缘势力,以示君臣相辅,选址中都则是其试图依靠政治干预实现地区地位攀升和权势转移最直接显著的做法。

其二,中都选址凤阳不仅契合洪武帝之愿,更是正中淮西集团下怀。淮西集团因辅佐洪武帝而起势,主要由徐达、汤和、李善长、郑遇春、郭英、蓝玉等人构成,集团内部人员均来自安徽省江淮地区,对凤阳府地区有特殊的情感,因此在议都时,洪武帝接连否定长安、洛阳、汴梁之属,提议“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1]881},得到了淮西集团的支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即便南京具备建都的绝佳条件,但是对于没有过多维系地缘政治团体经验的淮西集团而言,在不甚熟悉的南京建立并经营其政治圈并非易事。况明朝初立,朝中“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倾轧”较为激烈,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与刘基数起矛

盾,如“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匿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帝归,诉基僇人坛壝下,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7]3780},而面对朝中两种势力的争端,洪武帝虽表面上对准西集团多有偏私,但是实际上已是安抚制衡之举。“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而为之,且立覆’”^{[7]3780}。可见,洪武帝对准西集团的把控需要依靠李善长等集团中心人物。洪武帝对准西集团纵有倚仗,但也在提防其权势的不可控性,刘基建议洪武帝多用制衡之道,实则是暗示洪武帝淮西势力已不为帝控。洪武帝素多疑,对准西集团多有试探,曾赐宅于淮西首将徐达,“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旧邸者,太祖为吴王时所居也。达固辞。一日,帝与达之邸,强饮之醉,而蒙之被,舁卧正寝。达醒,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帝规之,大悦”^{[7]3729-3730}。可见其对准西集团已经不完全信任。淮西集团同样意识到依附于洪武帝个人终究不够牢靠,若能进一步扩大淮西集团的地缘势力,其所行制衡之道便会长期有效,于集团而言,实则是牢固了根基。明初筹划的凤阳府境,是明初淮西集团各部将的故土,其间多有亲缘,朋党众多,将中都选址于凤阳府境内,无疑更便于该集团培养地缘势力。况洪武帝已有意令“浙人监管淮人”^[8],回归凤阳则更有利于淮西集团在朝中与浙东集团对抗,这对该集团今后的政治命运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淮西集团更希望加速实现其发迹地的升崇,并极力促成营造中都之事。最终,洪武二年(1369)将中都选址落定于凤阳。

无论是洪武帝个人意志,还是以淮西集团为主的朝廷中枢,均希望通过中都的定址来实现故土的升崇,吸引朋党,进而推进各自培养地缘势力的政治目的。即便后来凤阳未能成为国都所在,但是凤阳府却依然作为“皖北一府”^[9]成为明朝行政区划中最尊贵的政区。洪武十六年特下诏:“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帝生于丰、起于沛,既成帝业,而丰沛之民终汉世受惠。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1]2394}其不仅有赋役优待,更是明朝重要的军屯区^[10]。地位随龙兴而升崇,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洪武帝对中都城的规建计划则更加凸显其急欲确立其王朝正统地位的政治愿望。

二、规建以“显正统”

洪武二年(1369)至七年(1374)是明中都城的主要规建阶段,同时也是淮西势力培势的主要阶段。此时的洪武帝一心重视中都城的建设,面对淮西势力的滋长未能有效应对。

朱元璋是极为特殊的一位帝王。历代改弦更张,均需师出有名,东汉刘秀兄弟,以“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而揭竿;隋末李渊父子联络关陇势力,以隋炀帝暴虐而起兵,而朱元璋则是以布衣起兵,时淮西集团亦尚未成熟,故而拥护当时舆论“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7]3682}的小明王韩林儿起事,一路破元。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克南京后称吴国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小明王韩林儿因水难而亡,1368年朱元璋便于南京称帝,改年号洪武^{[11]52}。故而在洪武朝初期,洪武帝亟须证明其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明中都的规建计划和修建规格恰是从帝位和国朝两个政治层面彰显洪武帝初期追求正统性的政治意愿。

从规建计划来看,明初洪武帝与群臣的议都时,曾言“今建业(即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皆称善”^{[1]881}。洪武帝表面上言南京可为国都,却辗转提议于凤阳再建中都,虽有陪都以为常,但洪武帝舍近求远地选择从未为都的凤阳为中都,其缘由有待探究。从后来洪武帝对都城的考察计划来看,彼时与群臣商议的南京“真足以立国”大抵是权宜之词,中都城才是洪武帝真正寄予厚望的国都所在。直到中都城遭罢建,十一年才正式确定以南京为京师,但洪武帝对为都南京一直不甚满意,仍然于全国考察新的建都之地。洪武二十四年(1391)“敕太子巡抚陕西,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12]。后因懿文太子病故,方打消寻都想法。纵使洪武帝已至晚年,仍感叹“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3]337}。由此可见,洪武帝最初以南京为都不过是附和朝臣的想法。此外,凤阳中都的建筑尺度、建筑构件规格均高于明南、北二京(如表1)。中都部分城垣的修建,如宫城和禁垣,使用了纯砖建技术,而在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北京城都没有达到这一规格,而是采取筑城常见的内夯土外包砖技术;此外,中都城内部建筑构件也极为精美,在午门券门及楼

台四周基部的白玉石须弥座上均雕嵌各种珍禽异兽、名花瑞草,而南、北二京同样部位的纹饰只有少量;中都殿址石础每块直径2.7米见方,且雕龙刻凤,

而后建的北京殿址石础直径仅1.6米见方,且未有雕饰^{[13]585-588}。中都规制之盛,实冠天下。洪武帝欲通过转移都城位置,转换臣民对其帝位的固有印象。

表1 明中都、南京、北京部分城门建筑规格对比表

/米

宫城周长(长、宽、高)	午门(长、宽、高)	西华门(长、宽、高)
中都 3 680(965、875、12.6)	140.3、41.35、12、7	71、36、12.6
南京 3 204(868、734、-)	98、27.5、11	26、22.4、11.7
北京 3 420(961、753、9.27)	126、38.44、12.7	暂缺数据

元末朱元璋据南京称吴国公,后自封吴王,故而在盘踞南京以谋天下时,是臣子形象。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欲迎小明王韩林儿入应天府,此行入南京多有定国之意,可韩林儿离奇落水身故,不久李善长“率百官劝进,表三上,乃许之,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11]52}。朱元璋便于次年“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11]52},在南京臣民的固有思维中,明朝的建立更像是承逝去的“小明王”之愿,洪武帝颇有代统天下之意,亟需转移南京臣民的视线,其在南京一日,便是时刻提醒世人其南京吴国公的身份,长此以往,极易引起他人对其帝位正统性的质疑。故而,洪武帝在位南京期间,时刻筹谋着迁都的计划,于凤阳选址中都正是最符合其心意的规建计划。若中都顺利成事,“凤阳洪武”便可逐渐取代“南京吴国公”概念,这对彰显其帝位正统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如洪武六年(1373)二月丁丑,“礼部奏制中都城隍神主,主用丹漆,字漆似金,旁饰龙文,如京都城隍之制,尚书陶凯因奏:‘他日合祭,亦何主居长?’上曰:‘从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11]439}可见最初洪武帝确有迁都中都的计划。

除了宣示帝位的正统,洪武帝对其国朝顺继的正统性也极为在意。初占南京就将原集庆路改为“应天府”,以表应天之意;在设立职官时,“命百官礼仪俱上左”^{[14]192},力图与元制有异;以“元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类是典,岂可取法”^{[14]193}为由极力反对仿元制设中书令;甚至从民族角度出发,一再强调明朝建立是汉民族恢复其中原统治的顺天之举,“始祀大社大稷……诏复衣冠如唐制”^{[11]52},除了以上“恢复正统”的措施,在规建的明中都结构上也处处彰显“正统”之意。

明建于元后,而元朝是蒙古部落建立,常居草原,故而在宫城阙宇方面的修建热情并没有汉民族那般强烈,除了用心修建元大都外,基本上没有进行什么城市建设。^{[5]126}一般人认为,明中都规建是上承元大都的修建理念,实则不然。元大都的布局本身就是蒙古族根据汉传统经典《周礼·冬官考工记》而

规建的^{[5]126},而汉民族却一向习惯将皇朝宫阙的建立与国统配合起来,认为国朝命运与都城的建立是否合理密切相关,优则聚“天子气”,劣则“散国运”。但是常年游牧于草原的蒙古部落在对待国都上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故而洪武帝视都城规建工程为“崇尚尚制,回复汉统”的作为。或者从心理层面说,“明时重建的南京城及其他诸城,主要还是起着重新肯定汉人国家存在的心理作用”^{[5]151},因此,凤阳中都的建立及规划,均不会“丧失其正统性”^{[5]127}。

明代有三京:南京、中都、北京。明北京城的修建时间较晚,而南京与中都均是在洪武朝修立,并且修筑时间多有重叠,但南京受地势所限,在城垣外观上不如中都城规整^{[13]585-587}。另外,中都城的建筑设计理念处处附和“汉统之意”。首先,明中都严谨遵循传统儒家经典《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5]的布局,按“旁三门”原则,在中都外城的四方城墙修建城门,“(按中都城)门十有二,曰洪武,朝阳,独山,涂山,父道,子顺,长春,长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左甲第,后左甲第,其长秋,父道,子顺三门后□,九门名犹存”^{[2]398}。前者符合传统十二星次,后合九州之数。据了解,南京城宫城留门四,禁垣留门六,外城则留门十三,而北京城皇城留门六,外城留门九,两京在留门方面均没有中都严格。此外,城垣格局建设遵循中国古代传统建都理念,即象天法地,讲究上合星宿,下合风水。中都城所建三重城垣,正合星宿三垣“太微垣、紫薇垣、天市垣”^[16],三重城垣均是矩形,形制规整,布局有序、层层内敛、规制森严,皇城基本落在中都外城和第二道禁垣“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对角线的交叉点上,意为国立中央。最后,整个中都城呈南向,背靠淮水,暂弃淮水之便,却在城南凿内外金水河,以通城内水气。以洪武门为正南门,以南北向洪武大街为都城主轴,贯通三重城垣,直至皇城内,但无正北门,以使皇城不至于被洪武大街割裂,另外可将“北气”阻隔,不至于皇城内部南北贯通,

此为“聚气”的做法。洪武帝始终认为“王者南面,以听天下之治,建邦宫土,设官分职,其制尚矣”^[17],以上做法均顺应史法,稽古建宫,上下相承,是汉民族回归中原“正统”的典型代表,这实际上是借助都城规制来实现社会心理暗示,突出其国朝“正统性”,减少质疑、回拢民心,尤其是重视国统礼法的士人阶层的民心,在宫阙规制上越符合该阶层的理念,就越能在朝野获得该阶层的舆论助力。由此可见,洪武帝追求帝位与国朝的正统,实际上是极力试图越过元朝的政治影响,表明其承继唐宋之类的汉族正统,而非部分学者所言的承继“元朝天下”(至少洪武朝非是如此)^[18]。一如最初营造“宋徽宗后裔韩林儿”的舆论,亦是其追求汉族正统的表现之一,其曾在诏书中明确“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众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19],尽力显示其国统为合法政权,此诏更是推翻元蒙政权,使明统主祭中原的明令。诚然,洪武帝对正统的追求,以及其所做的努力在后世得到认可,清乾隆帝就曾评价明统“又按三代以下,得国近正,首推汉高,次即明祖”^[20]。

无论是最初建造中都城的计划,还是在修建过程中尽力比照《周礼》,稽古建宫的修建规格,不仅体现了中都城本身中规中矩的建筑内涵,突出中都城具有的礼仪价值,更能够反映出洪武朝初期,洪武帝在意帝位和国朝正统性的心理。这一点也极大的影响了国初的政治生态,即帝王极力推崇正统,长期的心理暗示可能给洪武帝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其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更直接影响了洪武帝与勋臣集团的关系,进而成为洪武朝王权与相权之争的原因之一,而承载着洪武帝与淮西集团特殊寄托的明中都城的罢建很可能是成为了这场权势之争的牺牲品。

三、罢建以“横权势”

洪武七年(1374)至八年(1375)是明中都罢建阶段,虽然罢建诏令是于洪武八年(1375)敕下,但在此之前,罢建中都的端倪已然显露。洪武五年六月,洪武帝“作铁榜,申诫公侯”^{[1]1377}。洪武七年八月,洪武帝将中立府改为凤阳府,并析置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以为凤阳县。一方面敲打淮西势头,另一方面分置中都行政区划,规建中都的势头已经开始减弱。洪武八年,洪武帝巡幸中都之举则成为了罢建中都的关键。

洪武八年夏四月“上驻中都,祭告天地于圜丘……亲至中都,验功赏劳”^{[1]1681-1683},可见洪武帝在巡幸中都之前尚无意罢建中都,此时中都城宫室殿宇、社庙、公署及城垣已初具规模。洪武帝却在巡视过后决然罢建中都。“丁巳,上还自中都……诏罢中都役作”^{[1]1684-1685},虽“是以劳费罢之”^{[1]1685},但是这一说法似乎并非主因。洪武帝当初以“劳民”为由放弃了以汴梁为都的方案,却征调百万移民规建中都,耗费六年,规格甚重,中都即成,却又以“劳民”为由罢建中都,但民力已耗,“劳民”之忧并不能完全成立。且洪武帝至中都验工前,暂无罢建中都想法,却在几天的巡视后就决案罢建。可见,在这期间,洪武帝透过中都城的修建察觉到了不能容忍的问题,甚至可能是关乎国势是否安稳的问题,才会使其宁愿放弃中都城。而中都城能够牵扯到的政治风向无疑是洪武朝所谓的“勋臣集团”。

明中都的修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洪武帝与淮西集团翘首以盼的。洪武帝希望借中都城实现故土升崇、彰显正统地位,甚至是发展帝乡势力;而淮西集团则希望借中都城实现势力的培养与转移,各有目的的两股势力在中都城实现交叉,却引起了更大的矛盾。洪武帝极为看重身为帝王的独尊权力,淮西勋臣集团的权势越不受控制,对洪武帝统治的威胁就越大。在建国之初这种权势之间的矛盾尚不明显,但是在中都城的修建过程中,淮西集团不断培势,双方的矛盾便逐渐显露出来,洪武帝对中都城的决然罢建,正是宣示其对这场矛盾的强硬态度。

洪武初期,洪武帝与淮西集团的关系尚可,且国初局势未定,北有元朝残势,南部川蜀未安。“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14]155},洪武帝对淮西集团尚有倚仗。洪武元年“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余功臣进爵有差”^{[1]152}。洪武二年(1369)“制铁券赐功臣”^{[1]156},并设立功臣庙祭祀勋臣英烈”^{[1]163},洪武帝对勋臣集团的无上嘉奖无疑使集团势力快速滋长。规建中都时,仍以淮西集团要员李善长、汤和等人负责督建事宜,“四年,(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家户百五十,给佃户千百家,仪仗士二十家……命董建临濠宫殿。徙江南富民十四万田濠州,以善长经理之,留濠者数年”^{[7]3771}。名为督建中都,淮西勋臣集团在凤阳的仪仗却极为奢靡。在经理中都同时,各功臣更私自在天子故土、都城脚下修建了极为奢靡的府邸。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洪武帝“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1]1404}。虽是奉诏建立,但是众宅第的建造不但私自挪用了中都建工,增加了营造中都众工匠的工作

量,造成了工匠的愤恨和不满,导致洪武帝巡幸中都时遇到了强烈的民众抗议,甚至发生了令洪武帝勃然大怒的“镇物案”;还在宅第规格上尽显奢华,不惜逾制。功臣集团私挪建工、损害帝望、宅第逾制,都表明该集团已然不论尊卑秩序,且众侯宅第四散分布,环抱中都城,非但不具备清北京城规划严格的八旗居住区的规范性,反而在中都城这类“聚气”之地形成四面势力圈,等于将中都城包围在淮西势力圈内,此种种让洪武帝察觉为都凤阳非但没有使故土蒙浴皇恩,反而增加了故土民众的怨怼,更是弄巧成拙地为“淮西勋贵”打造了一个权势“培养皿”。

公侯宅第的逾制只是淮西势力发展的“一斑”。洪武初立、国家初定,朝廷却未能及时培养新的势力。为统一川蜀等地政权,明初多次征讨。在平夏之征中,作战要将主要来自淮西集团,“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德庆侯廖永忠为右副将军,滎阳侯杨璟、都督金事叶昇等率京卫、荆、湘舟师……颍川侯傅友德为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14]155},可见洪武帝对淮西集团依然倚仗甚重。而此时凤阳中都的规建工程正在进行,洪武帝为表重视,甚至于洪武五年(1372)下诏修建公侯宅第,这无疑使淮西集团营利于中都更加合法化。

以淮西势力为相,使其进入中枢,则是洪武帝助长淮西权势的又一决定。洪武二年(1369),洪武帝问相,欲立胡惟庸,刘基以为胡惟庸“小犊耳,将僨而破犁”^{[14]179},不足以为相,但是洪武帝仍在洪武六年(1373)立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让淮西势力彻底进入中枢机构,此时的洪武帝只是一味培养地缘势力,但是没有完全意识到淮西集团已经不能反映中央意识,开始与中央脱离。“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三百两,遂得诏入为太常卿,累迁中书参政,遂与善长深相结”^{[14]180},胡惟庸为相后,多擅权专利,结党营私,利用淮西集团造势,而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7]3771}胡惟庸因此与李善长交通往来,曾谋逆并遣人游说李善长,“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7]3772}。李善长生性伎刻,表面上虽未同意,但是面对胡惟庸的多次游说,已颇为心动,未将胡惟庸的谋逆意图告上,索性听任其谋逆,可见帝臣之间已有嫌隙。而其他淮西成员,如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滎阳侯郑遇春等人也因为“惟庸阴以权利诱之”而“因与往来,久之甚密”^{[14]181}。如此种种,均反映出中央权势与淮西集团的割裂关系,只是在国初,双方势力的对峙尚未明显。而洪武八年,实质上是中央集权与淮西权势正式交割的节点,正是中都城的罢建,使得双方权势

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

淮西贵族在中都盘根错节,相互依靠,利用乡里优势,已然形成了地缘关系;而洪武帝本意在凤阳发展地缘政治,给自己的帝位增加权势支撑,却适得其反。中都一旦建成,即便不为国都,只做陪都,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淮西势力,反而容易再次激起“移都之议”。故而洪武帝便有了罢都的想法,酝酿罢建理由,在明陵告祭时告的祝文值得探讨:

昔者元政不纲,英雄并起,民不堪命,苦殃不可禁。荷蒙昊天上帝后土皇帝祇悯世民之艰苦,授命于臣,赐以文武,人多良能。八年以来,除民祸殃。臣蒙上帝后土之恩,文武之能,非臣善为。当大军初渡大江之时,臣每听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既听斯言,怀之不忘。忽尔上帝后土授命于臣,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土木之工既兴,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将完成,戴罪谨告,惟上帝后土鉴之。^{[21]卷十二}

从以上《中都告祭天地祝文》的内容,可以提取以下信息。其一,中都所建的确劳民伤财极重,但中都工程即成,只得戴罪谨告;其二,洪武帝自述曾欲为都中原,但恐伤民,故而未能行事;其三,为都凤阳是当时群臣的意见,洪武帝不过顺势而为罢了;其四,中都规建工程弊端频出,势必不能继续了。在此时,洪武帝就有意向罢建中都了,很可能是其已经察觉到了淮西贵族利用规建中都而不断培势,并且“愈觉尤甚”,但是却不能激烈行事,以免引起朝中形势的动荡,遂只得放大“劳民”这一因素,让其罢建诏令更加合理。但是很显然,当时中都规格基本已经完成,宫室俨然,劳民多年,突然罢建,似乎更加浪费民力。另有记载,“镇物案”发生,有工匠向洪武朝施以诅咒,方使得洪武决意舍弃中都,如今看来,以上说法不过是洪武帝为罢建中都寻找的合理舆论。其实,在此篇祝文中就可以看出洪武帝与淮西功勋集团的关系已经极为微妙了。

在告祭中,洪武帝首先将营建中都之事辩白成群臣的意见,而此处的群臣指的是与洪武帝有同样地域背景的淮西集团,因为只有淮集团才会出于权力和利益的考虑,极力建议洪武帝为都凤阳。如此,营建中都之罪就被转移至淮西集团一方了。多年后,洪武帝颁诏曰:“朕自居江东三十六载,未尝

见日而临百官,自年初至于年终,每披星戴月而出,四鼓衣衣饭食,待旦临事……得罪者凤阳宫殿也,然非好离宫别殿而为之,当是时见浅识薄,意在道里适均,便于民供耳。”^[22]确实承认自己在凤阳中都的营建中存在过失,可见彼时祭天,洪武帝有意转移责任;另“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一言,展现出洪武帝的担忧与无奈。一方面,其意欲荣升故里,发展势力的初衷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使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此时凤阳地缘势力不受自己控制,但却不能一举解决,只能先尽力将自己摆脱此地的权力漩涡,唯有通过罢建中都才能彻底断绝淮西势力继续发展的势头。

最终,洪武帝于洪武八年下诏罢建中都。中都的罢建,使淮西集团失去了在凤阳无限发展权势的生长点,也没有了掣肘洪武帝的威胁,同时释放了中央层面与勋臣集团离心的讯号,故而在中都罢建后,淮西集团便逐渐式微。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右丞相汪广洋有罪,贬海南,赐死”^{[11]67},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谋为逆,事觉,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左都督丁玉皆伏诛,籍其家”^{[11]67},其他淮西功臣,“(洪武帝)命刑部以肃清逆党事播告天下,韩国公李善长,列侯胡美、唐胜宗、

陆仲亨、费聚,已故侯顾时、陈德、华云龙、王志、杨璟、朱亮祖……凡二十人”^{[14]183}皆被祸。曾经襄助洪武的勋臣终究倒在自己苦心营织的权势之下。中都城的罢建同样反映出洪武初期的政治生态:帝王追求升崇、正统与独尊,勋臣追求权势、利益及长久,中央集团与中枢集团相互离心,最终两者在相互试探和相互猜忌中触碰了矛盾底线。

四、结语

历史、政治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内涵是中国古建筑两重性之一^[23],而都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城池,其礼仪价值和政治意识远高于建筑实体本身。凤阳在历史上从未为都,中都城之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洪武帝及其势力集团的政治要求产生的,其罢建也宣告其原始政治诉求的破产。诚然,明初洪武朝互相试探、猜疑的政治生态即便没有中都城的规建,也会在后来逐渐显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与勋臣的倚功培势本就难以调和,况且其间还揉入了王权与相权的权势争端,两端权势的割裂趋势不可遏制,中都城不过是在国朝初立时期,两种权势动向均不明朗化,但又猜忌不断的复杂处境中而衍生出的牺牲品罢了。

参考文献:

- [1] 明太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魏家驛,张德霈.光绪凤阳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96.
- [4] 明太宗实录[M].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 [5] 施坚雅.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 [6] 易季和.凤阳县志略[M].民国二十五年(1936)影印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 [7]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8] 灵犀.大明江山三百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20:32.
- [9] 李强.明清以来凤阳城市地位的历史变迁[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8(1):24-29.
- [10] 张登璨.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军屯研究[J].中国地方志,2019(6):62-72+126-127.
- [11] 万斯同.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2] 陈文述.秣陵集[M].管军波,欧阳摩一,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222.
- [13] 喻学才,贾鸿雁,张维亚,等.中国历代名建筑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
- [1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5] 郑玄.周礼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23.
- [16] 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M].合肥:黄山书社,2003:218.
- [17] 柳瑛撰.成化中都志[M].上海:上海书店,2014:297-298..
- [18] 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J].学术月刊,2020(12):145-157.
- [19]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07-108.
- [20] 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10345.
- [21] 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M].万历年间刊本.
- [22] 庞崇.南京刑部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276.
- [23] 张驭寰.中国古建筑分类图说[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2.